

## 從萬隆會議談印尼與中共的關係

張耀秋

### 一、「萬隆精神」的破滅

來自八十一個國家的二百五十餘名代表於今（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在印尼西爪哇首府萬隆舉行萬隆會議三十五週年紀念會，並發表宣言，略稱：「亞洲及非洲國家感到遺憾的是，在五十年代嚴重擾亂國際局勢的許多因素及情況，仍然影響各國的關係。世界充滿著緊張、暴力及日益不安，超級強國的關係，越來越冒著爆發核子戰爭的危險」。但宣言只談一般性的原則問題，未涉及某些無法立刻解決的糾紛，甚至對許多重要的問題如蘇軍侵佔阿富汗、越軍侵佔高棉及兩伊戰爭等均避免談及，可見此次會議純粹是一場不具實質意義的「政治秀」。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至二十四日在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是由印度、印尼、緬甸、錫蘭（今稱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所發起，與會者共廿九個亞非國家，代表著當時半數以上的世界人口。中共「總理」周恩來亦率團參加會議，並在會中販賣「和平共處五原則」：互相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後來並由此「和平共處五原則」衍化成「萬隆會議十項原則」：(一)尊重基本人權，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二)尊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三)承認一切種族的平等、承認一切大小國家的平等，(四)不干預或干涉他國內政，(五)尊重每一個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單獨地或集體地進行自衛的權利，(六)不使用集體防禦的安排來為任何一個大國的特殊利益服務，任何國家不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七)不以侵略行為、侵略威脅使用武力來侵犯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八)按照聯合國憲章，通過如談判、調停、仲裁或司法解決及其他的和平方法來解決一切國際爭論，(九)促進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義和國際義務。

此萬隆會議十項原則，當時曾被與會的亞非各國代表譽為「萬隆精神」(Spirit of Bandung)。可是由於中共與蘇聯的顛覆侵略，亞非各地禍亂相尋，所謂的「萬隆精神」也隨之破滅無存。

熟悉中共外交統戰策略的人士認為，「萬隆亞非會議」實是中共政權成立以後玩弄「兩面手法外交」的開端。中共一方面在

一九五五年四月派遣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販賣其和平共處五原則，一面暗中培植印尼共產黨，並且策劃印尼共產黨掀起全面武裝叛亂，陷印尼於危殆的境地。此外，中共在東南亞各地亦玩弄其「兩面手法」，表面上與各國政府友好往來，暗地裏却不斷指使這些國家的共產勢力進行顛覆及游擊活動，並給予有力支持，包括武器供應及人員的訓練等。東南亞以及亞洲地區，其所以禍亂相尋，無法達到和平與安定，實因中共為亞洲禍害的根源。

此次中共「外長」吳學謙利用參加萬隆會議卅週年紀念大會的機會，師法當年周恩來的故技，在會上展開笑臉攻勢，高唱和平統戰濫調，聲言中共願意發展與所有亞洲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也不會干涉他國的內政；同時吳學謙更促請印尼在「和平共處」的原則之下，與中共恢復外交關係。惟證以過去三十年來中共在亞非地區掀起動亂的事實，則吳學謙之謊言，其誰能信？

所謂「萬隆精神」，本來就是子虛烏有，經過三十年世局的變遷，現在更無法向這種「精神」招魂。所有亞非自由國家，尤其是首當其衝的印尼實應吸取三十年來萬隆會議的教訓，覺悟到絕不可能與共產黨「和平共處」，更體認到民主自由與共產黨專制不可能並存。

## 二、「萬隆會議」對中共與印尼早期關係的影響

一九五五年在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對於中共與印尼的早期關係，發揮了促進的作用。當時由周恩來率領龐大代表團與會的中共，除在會中販賣其「和平共處五原則」外，並對印尼進行統戰活動，與印尼總統蘇卡諾及其他政要進行廣泛的接觸磋商。雙方在會後簽訂了一項「關於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象徵著北平與雅加達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

一九五六年九月底，蘇卡諾應邀至北平訪問十六天。中共竭力迎合蘇卡諾好大喜功心理，安排數次盛大歡迎場面及演說，並吹捧萬隆會議的成就，雙方更發表「聯合新聞公報」。

當蘇卡諾回國後不久，中共立即在該年十一月三日與印尼交換三項照會，宣佈中共願向印尼提供其發展輕工業所需的設備，並派遣專家前往印尼給予技術援助和接受印尼人員赴中國大陸進修。同時依據「商業信用貸款協定」提供一千一百廿萬美元，資助印尼清償以往對中共貿易的赤字差額<sup>①</sup>。

一九六一年三月廿八日至四月二日，中共「外長」陳毅應邀訪問雅加達，簽署了友好條約和文化協定。同年六月，蘇卡諾第二次訪問北平，雙方關係更見加強。一九六二年，當印尼企圖以武力奪取荷蘭控制下的西伊里安時，中共聲稱它將與其他亞非和

註① 國防部情報局編《匪情年報》，一九六七年，二一四頁。

共產國家組織志願軍，協助印尼奪取西伊里安<sup>②</sup>。稍後，印尼與荷蘭就西伊里安問題達成協議。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一至二十日，劉少奇偕同陳毅親訪印尼，雙方發表一項「聯合公報」稱：「雙方通過對現階段鬭爭的共同探討，取得了共同認識，並且一致認為當前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各國鬭爭是一個單一的、互相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人民完全支持印度尼西亞政府和人民粉碎英國殖民主義工具『馬來西亞』的鬭爭」<sup>③</sup>。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蘇卡諾第三度訪問中共，與周恩來在上海舉行會談。中共同意支持印尼對馬來西亞的軍事行動，包括訓練游擊隊、派出軍事顧問團；但要求印尼在第二次亞非會議中支持中共。

中共與蘇卡諾之間交往頻繁，除蘇卡諾三次訪問中國大陸外，中共頭目亦流水式的前往印尼訪問。蘇卡諾在中共支持下，具有爭取地區霸權的野心。如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蘇卡諾「對抗」(Confrontation)馬來西亞，即為最好的說明。一九六五年，馬來西亞當選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非常任理事國，蘇卡諾在惱羞成怒之下，宣佈退出聯合國。中共立即發表聲明支持印尼的行動，並大肆攻擊及詆毀聯合國。

一九六五年春天，蘇卡諾受共黨的壓迫，將平民黨與反共領袖所組成的「支蘇機構」加以解散，同時更起用共黨頭目，出任內閣要職。在與中共加強勾結之下，蘇卡諾於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尼獨立二十週年紀念會上演講稱：印尼正與中共、北越、北韓及柬埔寨建立一個「反帝軸心」，目的在把帝國主義逐出亞洲，同時高唱粉碎馬來西亞的口號，並在國內接管美國人所經營的橡膠園與油田油廠，封閉美國新聞處以及縱容暴徒搗毀印度大使館。

當中共與蘇卡諾政權的關係日趨緊密之時，蘇卡諾更在中共誘惑嗾使之下，進而與共黨狼狽為奸，因而導致了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印尼共黨發動政變(俗稱「九、卅政變」)。當時在蘇卡諾統治之下的印尼，軍方與共黨形成兩股對峙的勢力。政變首腦人物翁東(Untung)中校是總統府侍衛隊長，他和其黨徒在中共與印共支援之下，以清君側為由，將不與印共合作之「將軍評議會」屬下的六位陸軍高級將領殘殺<sup>④</sup>，俾使共黨掌握政權。所幸當時擔任陸軍後備司令的蘇哈托將軍，於驚聞政變後立即與倖免於難的國防部長芮蘇申上將取得聯繫，採取迅速行動，澈底掃蕩共黨及其同路人<sup>⑤</sup>。

註② 拙著「共匪顛覆東南亞的陰謀」，第七十二頁，僑務委員會僑務研究室編印，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註③ 卡諾(Stanley Karnow)撰「印尼共黨似在死灰復燃」，《華盛頓郵報》，一九七〇年一月廿六、廿七日。

註④ 當時有八位高級將領列入殺害的黑名單：Hadjio 少將，Parman 少將，Suprpto 少將，Sujoto 准將，Pandjaitan 准將，國防部長 A. H. Nsution 上將，陸軍參謀長 Achmed Jani 中將和 Achmed Sukendro 准將。結果其中六人遇害，芮蘇申倖免於難，Achmed Sukendro 赴平訪問亦倖免。另蘇哈托被視為立場中立者而未被列入名單中。

註⑤ 拙著「東協五國政情總論」第一六六—一六七頁，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初版，十月再版。

蘇卡諾在「九、卅政變」發生後，仍企圖掩蓋事實的真相，左袒印共，爲中共作辯護。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印尼陸軍遞出了「哀的美敦書」，迫使蘇卡諾簽署一項「授權書」，指派蘇哈托負責主持任務，維持治安<sup>⑥</sup>。

蘇哈托主持政務之後，首先宣佈取締共產黨，並逮捕蘇班德里奧等親共份子，改組內閣而由軍人控制；接著又宣佈限制總統活動的命令。在經過掃蕩之後，印共領導者非遭殺戮即已逃亡，數以萬計的共黨及同路人被捕，中共的使領館亦被關閉，導致中共與印尼外交關係的中止。擁有三百五十萬黨員及二千萬同路人的印尼共產黨，經此事變後乃告崩潰。印尼共黨叛亂被救平後，中共收容了若干印共份子，豢養在大陸，以便伺機再起。

### 三、印尼對中共威脅利誘的戒懼

自從一九六五年「九、卅」流產政變以後，印共已分裂成兩個敵對的勢力，一支是以追隨蘇聯和東歐共黨國家路線爲主的親蘇派，另一支是親中共派勢力。印共頭目查天多和一批同路人一直由中共豢養。查天多負責指揮在海南島上設立的地下廣播電臺——「印尼人民之聲」，不斷進行攻訐誣蔑蘇哈托政府的宣傳蠱惑。他原是蘇卡諾時代印尼駐北平的最後一任大使，歷經劉少奇、周恩來、林彪、「四人幫」以迄現在的鄧小平朝代，在北平都始終被奉爲上賓。北平對印共頭目的支持，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印尼第二軍區司令威多多將軍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向學生大會致詞時，指責中共陰謀赤化整個印尼，並正透過鼓勵貪污、走私、偽造文件和其他犯罪的勾當，以期達此目的。一九七七年間印尼共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艾吉托羅普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北平，中共「黨主席」華國鋒曾親切接待會談。當時印尼國防部長潘嘉賓曾以臨時外長身份加以指責，謂「中共主席華國鋒做了一項無助於中共和印尼立即關係正常化的行動」。

印共除在北平設立總機關外，已於一九七〇年成立七人委員會的最高領導單位，並有雅加達、東爪哇、廖島、楠島等地方局的設立，秘密進行爭取農民的活動<sup>⑦</sup>。

蘇哈托總統主政後，因鑒於過去中共支持印共顛覆印尼的陰謀，乃改採極爲堅定的反共立場。印尼與中共的關係自一九六七年以後便告中斷。其後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泰國雖相繼與中共「建交」，但印尼仍堅拒與中共恢復外交關係。

註⑥ H. P. Jones, *Indonesia: The Possible Dream*, (N. Y.: Hoover Institution, 1971), p. 393-394.  
註⑦ 同註⑥。

十多年來東南亞局勢已有重大變化，而中共不惜運用威脅利誘手段欲與印尼復交，尤其自鄧小平於一九七七年復出當權以來，更利用各種機會以表達此一願望。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訪問印尼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會晤蘇哈托總統時，曾轉達中共希望與印尼恢復邦交的信息，但為蘇哈托當面拒絕。其後中曾根轉述蘇哈托總統的話說，中共一直支持東南亞各國的共黨活動，亦即一九六七年印尼與中共中止外交關係的原因迄今仍未消失。一九八三年五月下旬，印尼外交部批准拆毀雅加達前中共「大使館」改建停車場的計劃，但延至十二月二日印尼部隊才進駐該座空屋，正式從羅馬尼亞大使館人員手中接管，中共對此曾提出抗議，並重申盼望與印尼恢復邦交，但亦為印尼政府所拒絕。

在東協國家中，對中共侵略本質瞭解最深者為印尼與馬來西亞，兩國首長經常強調中共才是東南亞國家長期而潛在的威脅。故美國擬議出售武器及轉移先進科技給中共，引起印尼與馬來西亞強烈的反對。印尼外交部長庫蘇馬特馬加於本年二月廿五日表示，他將要求美國澄清外傳美國援助中共海軍的問題。故美國國務卿舒茲近年曾數度親臨印、馬等國解釋美國的政策，安撫各國。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伍佛維茨於今年三月四日在雅加達說：「美國了解印尼對中共潛在勢力的關注」。由於印尼對中共心存戒懼，乃使中共謀與印尼復交的企圖迄未得逞。

#### 四、吳學謙進行統戰活動

今年四月下旬中共「外長」吳學謙利用參加萬隆會議卅週年紀念大會的機會，師法當年周恩來的故技，在會上展開笑臉攻勢，尤其對印尼曲意討好，大事拉攏。而印尼以其佔國家總收入約百分之六十和佔輸出總額百分之八十的石油，在八十年代初期價格下降，使印尼在經濟上受到很大損失，自一九八三年開始，印尼政府就採取經濟緊縮政策，大幅度貶低幣值，延緩主要建設計劃，並緩和金融統制。而且，為了從過份依賴石油輸出的困境中解脫出來，乃擴大石油以外的產品輸出。因此，去年十月印尼乃與匈牙利及蘇聯分別簽訂貿易協定，其後更不斷開拓共產國家的市場，積極推銷三合板、樹膠、咖啡與肥料等。而開拓中國大陸市場的構想亦是在此種背景下被提出來。

過去印尼與中共的貿易，多是通過香港與新加坡而進行的間接貿易，最近印尼工商界欲與中共進行直接貿易，以還免中間商人的佣金損失。今（一九八五）年一月吳學謙到新加坡進行統戰活動時，印尼工商總會會長吉多沙約諾曾和中共人員進行有關直接貿易問題的初步會談，且受到中共的蠱惑。印尼商會代表團原定於今年四月下旬訪問中國大陸，惟印尼政府對中共疑慮仍多，其外交部經濟事務主管蘇耶曾於四月十三日要求印尼商會展延其代表團訪問大陸的行程。此次吳學謙參加「萬隆會議」紀念大會之便，曾與印尼外長庫蘇馬特馬加舉行十八年來的第一次「正式會談」，今後印尼外長表示，雙方同意慢慢進行直接貿易。

印尼政府負責與中共展開直接貿易的協調專員穆迪奧諾於五月十五日透露，在蘇哈托總統與工商總會會長吉多沙約諾會談後，政府已批准印尼工商總會派代表團到中國大陸進行首次正式訪問。據五月初印尼工商總會會長吉多沙約諾表示，印尼工商總會將派遣五十名商人到北京，為兩國恢復直接貿易鋪路。這些商人在農產品、服務行業、航運、電子業及重工業方面，都是行家，其中八人將到香港與中共方面簽署備忘錄。

此次印尼商人恢復與中共直接貿易，印尼政府仍持非常慎重的態度。三軍總司令穆達尼敦促印尼官員和商人不要向新聞界多談與中共進行直接貿易之事，他並呼籲人民不要去中國大陸。代表印尼回教勢力的發展統一黨國會議員尤諾斯於四月上旬發表談話，敦促政府要嚴格監督印尼與中共的直接貿易活動。他警告說：「印尼與中共通商可能導致共產黨在印尼重新出現」<sup>⑧</sup>。印尼國家主義的「獨立報」最近的社評表示：「建立直接貿易關係是否不會產生問題，情況還不明朗。……北京可能利用此舉作為外交領域裏促進關係的一着棋。如果情況是如此，那麼，建立直接貿易關係的目的將會導致一種印尼無法接受的政治後果」<sup>⑨</sup>。印尼「武裝部隊報」在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社論中亦說：「撇開中共涉及政變及在東南亞各國共產黨顛覆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因素不談，我們也沒有任何客觀的需要與中共復交，……即使與中共沒有邦交，印尼在國際論壇上也沒遇到任何困難。相對來說，印尼反而享有和平與穩定」<sup>⑩</sup>。

由上述國會議員與輿論的立論來看，印尼朝野對於與中共進行直接貿易所可能發生的後果，疑慮仍多；是以中共欲藉直接貿易而導致恢復邦交的企圖，也仍不易得逞。

## 五、結 論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至二十四日，二十九個亞非國家在印尼萬隆市舉行「萬隆會議」，迄今已三十週年。在這三十年當中，亞洲局勢的發展固然是與「萬隆會議十項原則」背道而馳，「萬隆會議」的地主國印尼也未在所謂「萬隆精神」的庇護下獲得多少的好處，而印尼與中共的關係更因「九卅共黨政變」的影響而告中止。

中共為欲與印尼復交，自鄧小平於一九七七年復出當權以來，即用盡威脅利誘的手段，並利用各種機會以求達此願望，甚至

註⑧ 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第三十五版，曼梭撰：「印中恢復直接通商的歷程」，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

註⑨ 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第十四版，國大高級講師廖建裕作：「印尼着手處理中國問題」，一九八五年二月廿六日。

註⑩ 同註⑨。



曾托請美、日等國高階層人士向蘇哈托總統進言，惟仍被拒絕。

今年四月中共「外長」吳學謙又在萬隆會議卅週年紀念會上展開笑臉攻勢，企圖以直接貿易為餌，誘騙印尼上鉤。

印尼工商總會雖已派出代表團擇期往訪中國大陸，但印尼政府對於此事仍極慎重。外長庫蘇馬特馬加在國會國防與外交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中說，政府已就印尼與中共的直接貿易採行四個階段的政策：(一)是先研討直接貿易的可行性；(二)是與中共討論直接貿易的程序；(三)是雙方代表團交換訪問；(四)是如經考慮有其必要時，互相在對方首都設立貿易代表辦事處<sup>⑩</sup>。同時，印尼政府也已聲明：直接貿易與關係正常化是兩回事。關於後者，印尼已故副總統兼外長馬立克等曾主張與中共復交，但國防部則強烈反對，蘇哈托總統則支持後一立場，並提出中共與印尼復交的兩項條件：(一)中共發表聲明，放棄支持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包括印尼共產黨；(二)中共切斷與印尼的華裔社會的關係<sup>⑪</sup>。蘇哈托總統於今年四月中旬會晤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時，亦曾對此項條件加以說明。

至於印尼目前的外交政策，瑞士「蘇黎世日報」曾於一九八五年五月二日發表該報駐東南亞特派員佛里德曼·巴杜所撰：「變遷中的印尼外交政策」一文，其中說：「外交部人士強調，印尼與其他國家，譬如美國、日本、韓國、越南，以及蘇聯頻繁的外交往來，只不過是型態改變而已，實質上，雅加達的政策仍然維持不變，亦即以不結盟與區域安全為基礎。此外，印尼嚴密防範中共，更甚於防範越南，而且一向以不信任的態度對待東歐集團。印尼對日本及澳洲將維持一種矛盾的立場，但與西方國家將維持友好關係」<sup>⑫</sup>。

上述佛里德曼·巴杜所論各節，大致頗為正確。過去由於中共對印尼的侵略顛覆野心，印尼對其嚴加防範自屬理所當然。最近中共雖不斷對印尼極盡威脅利誘，企圖恢復邦交，惟衡以印尼所持的外交政策，與其對中共戒懼的態度，中共此一願望之實現，為期恐甚遙遠。

一九八五年五月廿四日脫稿

註⑩ 中央社雅加達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二日專電，載《雅加達郵報》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二日報導。

註⑪ 在印尼華僑現有四百五十萬人，但在印尼向來都是掌握了印尼經濟的牛耳。印尼人對華僑的反感，至今仍未獲解決。如中共加以利用，情勢堪慮。

註⑫ 香港《香港時報》第一版，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載波昂入中央社一九八五年五月二日電，佛里德曼·巴杜對印尼外交部和印尼戰略及國防研究中心所表達的觀點進行研究後所獲致的結論。